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一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6印张 168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 11072·216

定 价: 1.70元

ISBN7-201-00080-2/K·16

目 录

杨亦周传略·····	石 火	张竹涛 (1)
何其巩在北平·····		李泰荣 (23)
冯玉祥先生二三事·····		翦斯平 (39)
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	吴叔班	张树勇 (48)
天津出版史概略·····	杨大辛	张守谦 (98)
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	罗隆基	(136)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益世报》·····	韩偓奇	(154)
天津富华印刷局与胶印年画业·····	张钰铨	(157)
聚文山房兴衰小史·····	张圭颖	(166)
三津磨房同业公会·····	孙冰如	张紫宸 (169)
解放前天津的面粉工业·····	孙冰如	(187)
回忆天津解放初期的粮食工作·····	刘丕昌	(204)
德州首批船队运粮支援天津记·····	冯宝庆	(215)
我跟随溥仪二十八年·····	王倚斋	(218)

·补白·

张之江游说宋哲元	庞玉森(22)
卢金山小传	卢宝桐(97)
我编辑《旧剧集成》的经过	潘侠风(135)
齐协民与《中华日报》	王 木(153)
北洋官报局的变迁	纪文白(165)
解放前天津面粉的等级和商标	郭士贵(186)
私营面粉工业的改造和调整	郭士贵(203)

杨亦周传略

石火 张竹涛

一、家庭与青年时代

杨亦周，原名景濂，1900年10月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六日）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柏机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于本村设馆教书；母亲很贤慧，善操持家务，生六个孩子。亦周排行第五，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杨亦周童年时，家中生活富裕，有田近200亩，雇佣长工10余人。由于管理家务的长兄无行，因此在亦周14岁时，家境败落，土地除当卖外，还剩下80余亩，由佃农耕种。

1907年，杨亦周7岁，入家塾从父读书，除熟读《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及《四书》、《五经》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小学课本。1910年入行唐县立高级小学，1913年入正定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投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上私立大学，便回家从事农业劳动。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年秋，杨亦周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面对纷然杂陈的各种思想和主义，他最向往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的思想，也喜好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康白清等人的文章。

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和鼓舞下，杨亦周积极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1920年秋，他在参加反对北京大学不合理考试制度的斗争中，与教务长顾孟余发生冲突，10月被勒令退学。1921年暑期考入天津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原北洋法政学堂），主修法律。后来，接受父亲的建议，于1922年秋改学商科。1923年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学膳费无法筹措，杨便开始为《河北日报》副刊翻译英文小说和撰写杂文，以稿酬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业。《河北日报》总编辑发现杨亦周很有才华，聘他为副刊编辑，其困窘生活得以改善。

杨亦周在法政学校读书期间（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于树德经常到法政学校讲学，他甚为敬佩，特别是李大钊阐述的革命理论，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影响。他认识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朝不保夕之际，做为一个中国青年，应该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之责，致力于革命事业。

二、加入国民党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这时，杨亦周经于树德（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大，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但未履行入党手续。后来，于树德离开天津，由于校内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因此与国民党失掉了联系。

1925年暑期，杨亦周毕业后，留校任商科教员。当时有位名叫王宣的教员是国民党员，经常和杨亦周接触，给他看国民党

的文件和书刊。杨亦周接受了新三民主义学说，并于1926年7月，由王宣和张清源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

杨亦周加入国民党后，积极宣传孙中山学说，发展国民党组织，被誉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因此，被国民党北京特区执行部任命为天津市党部委员兼任直隶省党部秘书（当时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两个党部同设在天津法租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叛变，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进行“清党”，接着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做出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决议，进行“清党，分共”，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天津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大肆活动，疯狂攻击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当时，杨亦周笃信三民主义，加以受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包围，并不了解事实真象，因而深受影响。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那时，北方国民党内有新中国青年革命社（简称“新中社”）、三民主义实践社（简称“实践社”）及中山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大同盟”）三大派别。“新中社”的首领是童冠贤和马洗繁，“实践社”是李寿雍和萧忠铮，“大同盟”是丁惟汾。三派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初期，“大同盟”占优势。后来，“新中社”标榜“反对西山派，拥护汪蒋合作”，实质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占了上风，童冠贤也因此成为北方国民党的实权派首领。杨亦周是经过童的关系加入“新中社”的，并为童所器重。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攫取了党、政、军大权，实现了中央军事独裁。6月15日宣布“统一告成”。

至此，国民党在华北的省市党部由地下转为公开，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当时，阎锡山掌握华北军政大权，童冠贤与阎锡山互相勾结，控制京、津、冀省市党部领导权。杨亦周被指派为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此期间，杨在建立市、区党部及各种民众团体等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三、与蒋介石的决裂

1929年2月，天津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七名执委中有三名兼常委，杨亦周是执委兼常委之一，其他两名是任培道和宋藩周。3月，杨亦周当选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召开前夕，北方的“新中社”、“实践社”联合南方的“AB团”（即“反共团”），在上海开会，磋商结成同盟，以便在大会选举中争得几个中央执委的席位。杨亦周代表“新中社”参加了会议。蒋介石掌权两年以来，杨亦周逐步认清他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残酷镇压革命的反动本质，因此经常在市党部评论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抵制蒋的倒行逆施。在上海的联席会议上，杨极力主张发表一项宣言，要求蒋介石对内实施民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如不允诺，即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民党“三大”。他没有想到这个建议竟然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并对他进行了粗暴的批评。杨亦周愤然退出会议，返回天津。他的这一行动，遭到“新中社”领导人的严厉责难，他不仅未接受，反而促使他断然声明脱离“新中社”。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反蒋的呼声，随着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矛盾的激化，国民党内的反蒋气氛就更加浓厚了。杨亦周积极投入了天津国民党的反蒋活动。

1929年夏，蒋介石赴北平拉阎锡山反冯。当时蒋介石趾高气扬，密令沿途省市党部组织群众欢迎大会，制造“拥蒋反冯”的声势。但是，蒋介石乘坐的专车到达天津时，车站上竟冷冷清清，只有一些军政负责人到站欢迎，而党部的领导人却一个也没有露面。蒋介石大为震怒，一到北平即电令杨亦周，带领执委立即来平见他。杨等到平后，同蒋介石谈不拢。蒋怀疑他们和“改组派”有联系，于是电令陈果夫立即来平处理此事。陈到北平后，召集杨亦周、任培道、宋藩周等六个执委谈话，胁迫他们表态拥蒋，遭到拒绝，会谈不欢而散。杨亦周等回津后，以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个通电，揭露南京政府独裁专制和腐败无能，要求蒋介石停止军事独裁，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7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决议，解散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并给予杨亦周、任培道、宋藩周等七名执委以撤职处分，同时迫使童冠贤解散“新中社”。其后，参加反蒋活动的国民党人，遭到了种种政治迫害。

四、逃亡日本，留学英国

杨亦周在国内安全没有保障，决定逃亡日本。于是找同学筹借了500元旅费，和宋藩周、梁子青（河北省党部负责人，“新中社”成员）等人，于1929年8月，从天津乘轮船渡海，东赴日本。抵日后，他为进日本大学读书，争取河北省公费津贴，刻苦攻读日文和经济。1930年春季，杨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因为获得公费，才得以在日本安身。

在日本明治大学求学期间，杨亦周潜心研读政治经济学，思想观点上受河上肇（日本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的影响很大，从而由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埋头读书，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非常缺乏革命实践，因此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尽管如此，他的思想确实起了不少变化。过去，他虽然反对蒋介石，但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认识到蒋介石不仅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变成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从而放弃了对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的幻想，决定同国民党断绝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杨亦周和许多留日同学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忍辱留在敌国，每天埋头于收集资料，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写了20余篇文章，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和罪恶行径。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大公报》和《日本评论》等报刊上，对唤起同胞的觉醒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他还写了一本约40万字的《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解剖》，全书一时未能出版，便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国内分别出版了其中几个主要章节，如《日本的工业》、《日本的农业》、《日本的金融业》等。

在此期间，杨亦周和留在东京的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名曰“新中华学会”的社团，成员都是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如周成堂、王海波、梁子青、黄曦峰、杨玉清等。这些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并不相同，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也极不一致，为避免发生冲突，乃相约“只谈学术，不谈政治”。这个组织延续了三四年之久，会员发展到五十余人。

1933年夏，杨亦周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之后，得到河北省公费5000元，于是年秋天西渡欧洲，到英国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在伦敦，杨亦周遇到当时正在英国从事英共中国语言组工作的杨秀峰。老朋友异国相逢，分外亲切，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研究学术、从事革命斗争等彼此最关心的问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杨秀峰的精辟论点，使杨亦周的思想豁然开朗，认识到“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是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错误倾向。不久，他即加入留英学生的反帝同盟，同于斌、涂长望、侯雨民等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批判国民党的卖国投降主义，同国民党人控制的中国留学生伦敦学生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4年4月，杨亦周和于斌、涂长望等人参加英国工会所组织的工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时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他听到了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的报告，参观了学校、工厂和社会福利设施。后来又到达基辅、哈尔考夫、奥德萨等地进行考察，参观了重工业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访问了工人和农民的家庭。离苏时，又和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进一步深入地了解 and 探讨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和经验，以及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特点和将来要达到的目的。座谈中，这位中共代表针对杨亦周将要回国工作的思想情况，向他指出：“应该利用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掩护革命，不要人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历时两月的苏联之行，杨亦周大受教益，认识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乃科学社会主义之成功，非无产阶级专政

不能有此伟大成就”。在回英国途中，还游历了欧洲大陆诸国。

五、归国任教，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暑期，杨亦周应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聘请，离开英国，取道苏联、日本回国。途经日本时，又与杨秀峰相遇，并进行了诚挚的交谈。9月，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到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母校——法商学院（即原政法专门学校），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主讲经济学和经济史。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授这些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不久，任院秘书兼商学系主任教授。他曾向院长高文伯推荐杨秀峰任院秘书兼政治系教授。1935年夏，高文伯调离，由杨亦周暂代院长职务，不久升任院长。中共北方局特科天津负责人南汉宸，通过阮慕韩（法商学院法律系讲师）、杨秀峰与他建立工作关系。中共有些工作需要他做，或有些同志需要他掩护时，他无不热心帮助。温健公（经济系讲师）、何松亭（商学系讲师）、陈志梅（陈伯达化名）、闻久之（辅导课主任）、连以农（附设高职辅导主任）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共通过杨亦周派进该院任教的。他们在杨的掩护下，以教授、讲师的身份在校内外文化界和教育界上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并通过讲课和组织各种学会（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法学会等）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发动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从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天津各校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法商学院的师生是起了带头推动作用的，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法商成为天津大中学校的一面先进旗帜，杨亦周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何梅协定”后，强令原驻平津的于学忠统率的五十一军撤离至保定以南，使平津直接处于日军控制之下。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点燃了平津学生奋起反抗的怒火。杨亦周由于积极发动和支持法商学院学生的爱国行动，竟于11月21日夜被公安局逮捕。在法商学院及其他学校师生奋起抗议的巨大声势下，公安局长刘玉书恐事态扩大，又不得不把杨亦周释放。接着齐燮元又唆使其子利用与杨的师生关系，反复游说，劝杨参加“华北自治联盟”，杨为摆脱敌人纠缠，决定辞去院长职务，秘密离开天津。

1936年2月，杨亦周应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黄松龄（中共地下党员）的邀请，担任名誉教授，讲授世界经济史。杨亦周在中国大学任教期间，在杨秀峰、黄松龄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华北各界抗日联合会”和“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在文化界、教育界上层人士中开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急欲鲸吞华北，步步紧逼，而国民党政府则退让不已，华北面临步东北后尘的危机。平津高等院校计划南迁，爱国师生纷纷准备投笔从戎。在此形势下，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和杨亦周一起研究，决定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当时在华北的国民党军人中张荫梧有一定的实力，并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在博野办了一所四存中学，中国共产党人温健公去该校担任了秘书主任，杨亦周也常去博野同温、张联系。经过周密研究，他们组织了一个名曰“华北人民抗日联盟”的秘密抗日团体，计划利用暑假在博野开办训练班，培训开展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此事被国民党华北军政负责

人宋哲元侦知，迫令张荫梧停办训练班，这个秘密抗日团体因而夭折。

总之，这一时期，杨亦周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和合作者，在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六、在西北农专

1936年7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邀请杨亦周去该校担任秘书长，兼农经系主任教授。他即离平赴陕，到武功西北农专任职，主讲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杨亦周支持农专学生和西安市学生联合在一起，声援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爱国行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条件。农专校长辛树帜被这一急转直下的形势吓坏了，急急忙忙带着他从南京聘请来的一部分教授离开西安，校长暂由杨亦周代理。杨当即组织涂诒、薛愚伍等思想进步的教授，共同主持校务，致力于“充实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对学生则强调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鼓励他们栽培作物和植物；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从而使校内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局势有所逆转，辛树帜又于转年2月回到农专主政。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杨亦周被推选为武功农专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他动员全校师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捐献财物支援前方。

1937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开赴山西前线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西安、太原等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推动后方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战争。杨亦周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会见过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但因武功距西安约90公里，交通不便，因而联系亦不经常。

1938年夏，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下令将北平农学院和西北农专合并为西北农学院。为把这所新组建的高等学校控制在CC派手里，陈立夫派了张丕介等一批亲信到学校担任训导长等职务，掌握政训大权。张丕介不仅排挤杨亦周，对辛树帜亦有所不容；同时对两校原有教职员工进行分化瓦解，打击爱国力量。对学生则是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张丕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有一天他们把张丕介从被窝里掏出来痛打了一顿，然后强迫他当夜离开学校。陈立夫得知后，下令开除学生领袖，因而激起学生们的更大不满，掀起了罢课风潮。杨亦周和辛树帜站在学生一方，同CC派进行了斗争。1939年冬，陈立夫下令免除辛树帜院长职务，调农本局任顾问。杨亦周被迫离开了西北农学院。

七、在西安兴办实业

1939年冬，杨亦周到了西安，经辛树帜介绍认识了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请他担任西北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要他任甘肃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农本局总经理何廉也请他出山，当农本局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他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农本局办事处处主任的职务。胡宗南则给了他一个参议名义。

农本局的任务是办理农田水利贷款，建立粮食仓库，经营

棉花运销,以及在农村办理合作金库等。他认为此事可以为农民办点实事,符合他的愿望。他拨给陕西水利局一大笔贷款,积极支持开凿和整修渭惠、梅惠等灌渠,使200余万亩农田受益。他还在农村兴办了几十个合作金库和仓库,收购和运销40余万担棉花,支持了西北纱厂的生产。

杨亦周在农本局任职近两年,深受何廉赏识,称赞他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办实业的专家。1941年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挤走何廉,派自己的亲信到农本局。杨亦周立即辞去职务。何廉辞职后,为金城银行财团创办陕甘实业公司,何自任常务理事,请杨任经理。杨接受了邀请,从而走上民族工商业的道路。陕甘实业公司成立时,金城银行投资法币8亿元,并准许透支到16亿元。他以此为资本,经营棉花收购、运销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又在西安开办两个工厂——陕甘制革厂和陕甘毛织厂。由于产品质量优良,行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等省。接着,在甘肃永昌县又办了一个畜牧场,从事改良羊种工作。他既有经济理论基础,又精于管理企业和经商之道,再加上当时后方商品奇缺,因此所获利润甚高。至抗战胜利时,陕甘实业公司的资产比原投资增长十余倍,由八亿增至近百亿元,为金城银行积累了大量资财。杨亦周在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名声大增,蜚扬西北。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理兼西北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闻名求见,二人结识后,束立即邀请杨兼任雍兴公司协理。他以“业务繁忙,实难分身”为由,婉言谢绝。1945年夏初,束又提出把雍兴公司全盘交他管理(雍兴公司是当时西北最庞大的托拉斯性质的官僚资本企业),杨再次辞而未就。

八、重返天津，主持中纺公司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何廉电邀杨亦周赴渝商谈工作。他到重庆后，何代表金城银行董事会聘请他担任天津分行经理。此时，童冠贤已就任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束云章已被宋子文委派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经理。童冠贤坚邀杨担任副署长，而束云章又请他出任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后来，三人屡经商谈，达成一条协议：杨亦周可同时担任这三个职务。

1945年11月，杨亦周回到被日军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天津。最初，以救济分署工作为主。后来，束云章连续来电，催他就任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迅速开展业务。1946年初，他正式就任。这时，他对金城银行的工作已无兴趣，所以迟迟未就职。何廉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肯放过他，1946年上半年曾两次亲自到天津找他，恳切要求他兼任天津分行经理职务，他为照顾何廉的关系，答应挂个不领薪资的经理名义，主要工作由副经理夏彩臣、李伯坚负责。

1945年11月，杨亦周接手筹备救济分署办事处时，段希彭从张家口来信，请他在分配物资时给解放区拨一部分卫生器材和医药等物品。在救济分署正式办公后，他派出两名美国工作人员到张家口调查了解情况，美国人回来报告说“张家口物资十分缺乏，特别是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据此，他开会决定先给张家口运送一批急需的物资。当时，在北平的童冠贤也同意这样做。不料大批物资准备发运时，被李宗仁和孙连仲发觉，下令阻止。童得知后也变了卦，不敢再坚持原来决定。杨亦周十分生气，因此，在1946年2月辞去天津救济分署副署长的职务，把精力集中于经营中纺天津分公司。